

姓名：俞钦扬

学号：120020054

任课教师：林成川老师

## 人性与文化的“黑白”

### ——基于阴阳视角对黑娃与白孝文的人物分析

#### 一、前言

陈忠实的《白鹿原》作为一部民族的秘史，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大部分角色都拥有性格鲜明且始终如一的形象特质。而黑娃与白孝文则是少有的特例，两人的一生大起大落、跌宕起伏，都以各自的人生转折点为分异，经历了性情、思想和价值取向上翻天覆地的变化。阴阳是研究变化的哲学观。本文试将两人的人生际遇交织在一起，通过对两者生命历程、人物形象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比较，分析人物之间和人物内部一“黑”一“白”、同根互补、对立制约、相互转化的阴阳关系，并由此探究陈忠实在这两个小人物身上寄托的人性观、文化观。

#### 二、人生的“黑白”

##### （一）阴阳的起点

黑娃与白孝文自幼时起便呈现出相伴而又相克的关系。两人皆成长于白家，虽不属于宗法血缘上的同源，也算空间位置上的同根。但二人的阶层身份和所受教育却有着天壤之别。白孝文是德高望重的族长白嘉轩的长子，享受着地主阶级的优渥生活，从小接受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是儒家传统的未来继承者。而黑娃只是长工鹿三的儿子，虽然受到白家处世原则的耳濡目染，但贫穷的家庭状况和阶级的不平等却加剧了黑娃的内心冲突和自卑情绪。儒家的仁义道德虽给黑娃树立起精神上的理想模范，却无法填补阶层间巨大的现实鸿沟。白嘉轩为黑娃取了一个儒雅的学名——鹿兆谦。然而不仅黑娃对这个学名无动于衷，学堂里的同学也依然唤他黑娃。只有孝文兄弟记住了这个学名，每唤必是兆谦。黑娃因此增加了白家兄弟的敬重，但这份敬重的本质却是疏离。“他终于耐不住白家兄弟方桌上的寂寞，把自己的独凳挪到鹿家兄弟方桌上了。”<sup>1</sup>黑娃对“鹿兆谦”这个名字的抗拒，本质上体现出他初始阶段与儒家相斥的价值取向，也预示着两人日后人生走向的分野。伪名“鹿兆谦”与白孝文同

---

<sup>1</sup> 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66页。

根同源，然而真实的黑娃却与孝文各自占据思想的阴阳两极。

## （二）阴阳的置换

田小娥的出现，构成了两人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黑娃逐渐拉开了出走与反叛的真正序幕，白孝文却在一瞬间走向沉沦与堕落的谷底——人性的阴阳由此巧妙地转换着。

“黑娃骨子里的叛逆性是无意识、本能的”，而“田小娥非人的遭遇及其与黑娃的结合强化了黑娃的反叛性，使其为争取人格尊严而抗争。”<sup>2</sup>烧粮仓、参加农讲所、开农习班、建立农协、跟随习旅长参加暴动、成为土匪的“二拇指”……黑娃毅然决然与传统决裂，在原上掀起一系列的“风搅雪”，反叛性成为黑娃人格中最鲜明的旗帜。然而黑娃的反叛充满了农民革命的认知局限性，反叛的懵懂与不彻底性注定了黑娃人生道路的迷茫与徘徊。且反叛之下，传统仁义观的影子仍若隐若现，构成黑娃人格的阴阳两面。黑娃成为土匪时的那句自嘲“堂堂白鹿村出下我一个土匪啰”<sup>3</sup>，以及得知父亲为杀害小娥真凶时的惶恐，都验证了黑娃反叛的表面之下，儒家伦理深入骨髓的浸染。同时，黑娃为人处处透露出的忠勇与重义的品质，本质上亦与儒家精神相通。只不过，生存的需求与乱世的动荡，使得反叛性成为黑娃的人格主导，掩盖了他性格中被儒家称为“善”的品格。这一切也都为后文黑娃人格的阴阳逆转做了铺垫。

而对于白孝文来说，鹿子霖借田小娥之手的陷害，却是以摧古拉朽的方式，扭转了白孝文内心的价值天平。与小娥通奸，仅仅是白孝文压抑已久的生命原欲的反弹与释放，是自然性冲破社会性束缚的体现。而随后父亲近乎冷酷的惩戒措施和村里人的百般羞辱，才是真正激发他人性之恶的原罪。他一下子从白家用仁义铸就的高堂掉进了残酷冷漠的世俗地狱。人世的变故让他从小赖以信仰的儒家仁义观沦为笑话。成为乞丐和烟鬼、拆家卖房、抛妻弃子，不仅是他泄愤式的报复手段，更是对传统道德观的践踏与弃置，是他人性阴暗面的全面苏醒。从此，“活着”代替了“仁义”，成为他的人生信条。他进入保安大队，化作国民党权利机器中的“螺丝钉”，最后做了革命起事的投机分子，摇身一变成为人民县长。为了生存利益，他一路踏着敌人、恩人乃至亲人的尸体，不择手段、攀附权力、机关算尽、步步上位最终卷土重来，“至此白孝文已完全是一个阴谋家，甚至是一部残害人的机器，在他心目中已没有了亲情、爱情和友情。”<sup>4</sup>从至阳滑向至阴，白孝文的转变最为极端和彻底，也具讽刺意味。

<sup>2</sup> 王君梅：《从黑娃和白孝文看传统文化面临的困境》，《名作欣赏》2009年第20期，第129页。

<sup>3</sup> 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57页。

<sup>4</sup> 王君梅：《从黑娃和白孝文看传统文化面临的困境》，《名作欣赏》2009年第20期，第130页。

### （三）阴阳的终点

回乡祭祖是两人性格定型的标志性事件。历尽沧桑、流落半生的黑娃再次归来，他回原的目的实为了终止精神上的流浪。戒烟、娶媳、拜师、读书，脱胎换骨、学为好人的他出人意料地皈依了曾经的对立面，虔诚地跪倒在祠堂之下，并正式接纳了“鹿兆谦”这一学名。儒家文化的洗礼彻底涤荡了他反叛的心气，仁义礼法成为了黑娃新的精神认同和灵魂依托。与之相反，白孝文的祭祖则完全是披着权谋的“演戏”。他精心设计回乡行程的全部目的，是为了“以一个营长的辉煌彻底扫荡白鹿村巷土豪和破窑残存着的有关他的不光彩记忆。”<sup>5</sup>表面的风光是他走进祠堂时“虚颤”与“憎恶”的绝佳掩饰。儒家文化也不过是他生存路上可利用的道具，外表“仁义”的他已经彻底背离了“仁义”之道。

黑娃以一个逆子的身份重新投入传统的怀抱，而白孝文则由传统的继承者裂变为传统的背弃者。朱水涌在分析两者人物塑造时指出：“（两人）正好从相对的两个方向起笔，描画了一个文化历史的圆圈：白孝文的起点是黑娃的终点，黑娃的起点则是白孝文的终点。”<sup>6</sup>至此，两人戏剧性的人生完成了命运的轮回，构成了阴阳太极图的经典循环。

## 三、人性的“黑白”

### （一）复杂的人性观

“一念成佛，一念成魔”是黑娃与白孝文的人生写照。对黑娃与白孝文的讨论绕不开人性善恶这一话题。然而，简单认为黑娃的变化即由恶转善，白孝文的变化即由善转恶，此种认识是极为肤浅和片面的。善恶作为特定社会及文化体系下的主观道德判断，具有不同时代的价值标准，在不同的伦理视角中也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换言之，对人性善恶的理解不应只是对复杂人性片段式的截取与抽离，而应认识到善恶具有同阴阳一样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特性。夏祖恩评论《白鹿原》时赞许陈忠实“在刻划人物的时候抛弃了形而上学人性论观点，采取了人性善恶兼有的现实主义的态度。”<sup>7</sup>陈忠实对黑娃与白孝文的人物形象塑造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现实主义的复杂人性观。

### （二）黑娃的“伪恶”与“伪善”

黑娃之“恶”最初体现在他不听白嘉轩的劝阻，娶了为宗祠所不容的田小娥。与小娥的偷情，虽然起初有违背道德之嫌，但两人日后的感情却逐渐升温、由肉至灵。搬到窑洞后的

<sup>5</sup> 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462页。

<sup>6</sup> 朱水涌：《〈红旗谱〉与〈白鹿原〉两个时代的两种历史叙事》，《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5期，第67页。

<sup>7</sup> 夏祖恩：《〈白鹿原〉的现实主义精神初探》，《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00年第3版，第4页。

生活虽然清贫，两人却自食其力，为幸福的家庭生活打造出一片小天地。虽然不被村人接纳，两人却不离不弃，即使黑娃远去后，也依然一心一意思念小娥。他对小娥的真诚关心与平等爱慕，无疑是进步爱情观的体现，是鹿兆鹏所赞赏与羡慕的“自由恋爱”。后来黑娃背井离乡，成为土匪，砸碎乡约，打断白嘉轩的腰，这些被视为不孝与叛逆的罪孽之举，亦是族人站在传统道德制高点审判下的“恶”，实则不乏反封建的进步性，本质上是一种“伪恶”。

而最后黑娃洗心革面、立定成圣，虽是真诚悔改的善举、道德层面上的“学为好人”，却是思想上、革命性层面上的妥协与倒退。毕竟，白嘉轩与朱先生极力倡导的儒家传统之善，也不乏吃人和虚伪的一面。黑娃以过去小农世界里耕读传家的理想作为精神标杆，孰不知这种理想本身在现实世界中已经摇摇欲坠，黑娃追求的“善”只能是不切实际的虚幻泡影。

### （三）白孝文的“伪善”与“伪恶”

白孝文最初的善面是在家族的“温室”中形成的。不似白嘉轩的处世原则经过了种种磨难的淬炼而愈发坚毅，白孝文的“善”徒有表面和暂时的稳定，因为这并不是他发自内心的价值认同，只不过是家族的要求与多年的习惯养成。此种以自然欲求为牺牲的、未经考验的“善”，自然也就拥有了一触即破的虚假性和脆弱性。黑化后的白孝文更是将这种“伪善”演绎得淋漓尽致。

而白孝文后期的阴险狡诈也并非全然极致的“恶”。失去地位脸面全失，更经受了饥荒的生命威胁，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绝望足以摧毁一个人的意志。外人眼里的“恶”在他看来不过是唯一的生存之道，是他通向成功的必经之路，而乱世之中的自保又有何错？更何况，此种“恶”的根源更在于家族和制度，白孝文也不过是家族斗争的牺牲品，是结构性之“恶”下的衍生物。“好好活着。活着就有希望。”<sup>8</sup>这段充满正面意义的人生感言又何尝不体现着“恶”的矛盾。白孝文的罪行无法洗脱，但其“恶”的部分合理性与正当性却不能被忽视。当把白孝文的“恶”放到具体的家族成因与时代背景下进行考量，也许能看到“恶”背后可以理解和通融的部分。

### （四）善恶二元对立的消解

运用阴阳的架构，陈忠实借黑娃与白孝文之身，不仅展现了善与恶之间的斗争性，更揭示出善与恶自身存在的矛盾冲突，即善与伪善、恶与伪恶的相伴相生、对立统一与互相转化。对于这一层二元人物结构，余蕾解读到：“二元对立同时转向自身变异对立的复杂性，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难有一个确定的无疑的道德视点。对立变动的因素从一对繁衍成多

---

<sup>8</sup> 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470页。

元。”<sup>9</sup>人性的黑白两面既存在于矛盾的个体间，又存在于个体内部的人性本身。阴阳视角下，陈忠实消解了中国传统观念里的善恶二元论，用历史、辩证和发展的眼光代替个人视角下一刀切式的简单定性，将人性的度量扩展到更高的维度，呈现出更深刻、更完整的现实主义人性观。

#### 四、文化的“黑白”

##### （一）传统文化的两面性

儒家传统文化是左右黑娃与白孝文命运的“掌舵人”。对于个体的探讨也终将归于文化的影响，以及对传统文化道德机制和伦理体系的剖析。鹿三曾认为导致黑娃和白孝文堕落的主要原因在于田小娥，殊不知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儒家文化作为群体文化，缺乏对个体自然欲求的尊重，本质是对人性的打压。而黑娃的回归则又彰显了传统文化的正面力量和对人性的感化作用。传统文化具有阴阳两面的特性，陈忠实洞察了这一文化真相，并以之为基础，借黑娃与白孝文寄托了他对文化出路的深思。

##### （二）黑娃与白孝文的文化象征

文化的出走与回归，常常是中国人对待传统的两种状态。从文化角度出发，黑娃与白孝文的人物形象则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隐喻，其抽象化的精神，构成了两种典型人格与符号化身——白孝文代表了由顺从传统走向异化的文化路线，而黑娃则代表了由反叛传统走向皈依的文化路线。这两种文化人格，实则衍生出两种相反相成的力量，深藏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在历史的发展中此消彼长、调和相生，实现文化发展的动态平衡。“有人抛离，有人回归，时有离去，终究返回，这正是一种民族历史处于恒态不衰而又不无变动的表征。”<sup>10</sup>

人类学家米德曾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提出了有关文化的三个概念：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指以祖辈为权力和话语中心、后辈向祖辈学习的文化；并喻文化始于前喻文化的崩溃，为代际冲突的开端，每一代人的学习发生在同辈之间；后喻文化则凸显着时代飞速变化中青年人的力量，祖辈需向后辈学习。<sup>11</sup>

《白鹿原》的时代大背景正是并喻文化的体现，各种政治力量的倾轧带来社会巨大转型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传统的异变。白嘉轩、朱先生所守护的传统宗法文化作为前喻文化已

<sup>9</sup> 余蕾：《〈白鹿原〉人物形象结构解读》，《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3版，第120页。

<sup>10</sup> 朱水涌：《〈红旗谱〉与〈白鹿原〉两个时代的两种历史叙事》，《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5期，第67页。

<sup>11</sup> 米德：《文化与承诺 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周晓虹、周怡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01页。

处于崩溃的边缘，白灵、鹿兆鹏、鹿兆海等所倡导的新文化、新主义作为即将到来的后喻文化也正欣欣向荣、蓬勃发展，两代人皆与自身的同代人学习竞争，代与代间的矛盾代沟也日渐激化。

而黑娃与白孝文则是徘徊游离的文化浪子。黑娃的回归，是受到前喻文化的感召，被祖辈的榜样唤起心中的文化自认感，而向前喻文化的回靠，本质上归因于前喻文化的惯性、连续性与世代性。而白孝文的异化，消解了长辈的权威、产生了自发性，在变动的世界中企图寻找新的、自我的生存方式，本质上是向后喻文化的过渡。

两人的结局也颇有深意。黑娃最终死于白孝文之手，便象征了回归的力量已然不敌异化的力量，以及并喻文化时代中前喻文化的没落。黑娃所投向的文化传统，已经在农业社会和宗法制度的没落中走向式微。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前喻文化，基于其世代延绵、香火不断的需要，也因此具有了一定的封闭性与保守性。正是此种文化特性让黑娃所代表的文化回归之路受制于时代的局限。中国正经历千年未有变局之际，儒家的土壤早已没有了现实的立足之地，单纯的皈依无异于开历史的倒车，根本无法拯救危在旦夕的中华民族文化。

白孝文所代表的文化之路根植于动荡的现实世界，兼具传统的表面与反传统的内核，由于时代的借力不至淘汰。然而作为并喻文化向后喻文化过渡期间的一个畸形产物，它并没有同后喻文化一样厚积薄发的强大生命力，而是因其变异和扭曲的实质，不断粉碎、瓦解、反噬传统，又无法从根本上重塑民族文化之灵。

文化的阴阳平衡被打破，前喻文化的传统力量因落后而趋于淘汰，并喻文化中的新兴力量虽然强大却无法持久，而作为真正制衡力量的后喻文化却还未完全成熟与崛起。文化的回归与反叛问题，不仅是当时的文化困境，即使放置今天也依然值得深思。对于传统问题的审视，体现着陈忠实深深的文化隐忧。新一轮的文化平衡，必然需要发展一种超越性、颠覆性的力量，克服保守性的同时又能实现传统的扬弃，促成文化的迭代更新。如何对待传统？陈忠实没有在小说中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在展现了传统两面与不同的文化态度后，留下了一个未完待续的阴阳局，启发后人思考。

## 五、结论

二元结构是《白鹿原》塑造人物与情节时的一大特色。陈忠实有意或无意地化用了与中国传统的阴阳哲学，用于塑造黑娃与白孝文的人物形象。两人的生命历程首尾相连，织成彼此交汇的人生图景。陈忠实对人物背后人性与文化的深层探究，充分挖掘了人事物之间与人事物本身的矛盾性，体现了辩证统一的哲学认识。在改革开放初期，陈忠实对人性与文化的

深刻洞察与辩证思考，无疑有助于当时的思想开放，启发人们从多角度认识人性，同时在传统文化饱受争议、历尽波折的当时，启发人们思索传统儒家文化与现代中国的关系，并探寻新的文化出路。即使在今天，黑娃与白孝文形象仍然具有真实性和现实意义，两者作为对立统一的阴阳两面，以其丰富的人性和文化内涵，投射在个体心理与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对当今读者解读人性、对待传统与发展文化等方面都有着莫大的启示作用。

(字数：6024)

#### 参考文献：

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年。

王君梅：《从黑娃和白孝文看传统文化面临的困境》，《名作欣赏》2009 年第 20 期，第 128-130 页。

朱水涌：《〈红旗谱〉与〈白鹿原〉两个时代的两种历史叙事》，《文艺理论研究》1998 年第 5 期，第 65-71 页。

夏祖恩：《〈白鹿原〉的现实主义精神初探》，《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00 年第 3 版，第 1-9 页。

余蕾：《〈白鹿原〉人物形象结构解读》，《湖南社会科学》2004 年第 3 版，第 118-120 页。

米德：《文化与承诺 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周晓虹、周怡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年。